

流变 · 探索 构建

—— 世纪之交汉语小说语言实验论稿

● 郑丽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流变 · 探索 构建

—— 世纪之交汉语小说语言实验论稿

● 郑丽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变 探索 构建 / 郑丽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5004 - 9324 - 2

I. ①流… II. ①郑… III. ①小说 - 文学语言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4582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成 树

责任校对 石春梅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34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论：走近风生水起的汉语小说语言实验	(1)
第一章 契机：小说语言实验的历史语境	(8)
一 拥抱时代赐予的转型机遇	(8)
二 寻觅小说佳境的叙事探索	(15)
三 开拓辽远深邃的语境空间	(25)
第二章 重构：小说语言实验的运演态势	(45)
一 异军突起的原生态叙事	(45)
二 蔚成风气的跨文体构建	(63)
三 贴近生活的口语化嬗变	(91)
第三章 坚守：小说语言实验的传统张扬	(112)
一 不弃不离的经典追求	(112)
二 色彩斑斓的地域特质	(124)
三 永难消解的民间情结	(153)
第四章 创新：小说语言实验的多维变革	(169)
一 叙事审美的陌生倾向	(169)
二 文学话语的哲理意蕴	(184)
三 呼啸而来的网络元素	(191)
第五章 异化：小说语言实验的技术误区	(201)
一 颠覆高雅的粗鄙书写	(201)
二 邯郸学步的传统叛逆	(209)
三 欲望营构的低俗品位	(217)
结语：将汉语小说语言实验进行到底	(231)
参考文献	(233)

引论：走近风生水起的汉语小说语言实验

当今汉语小说的语言叙事形态，风生水起、汹涌澎湃，正在持续演绎着一场深度的世纪转型，依据学界的共识，我们将其名之曰“小说语言实验”。

这场“小说语言实验”中的流变、探索与构建，实际上已经运演了多年。如今，跨过了新世纪的门槛，它似乎已经抵达了应该回望的高端。从某种意义上说，流变、探索与构建，是当下小说语言发展态势和小说语言研究现状的真实镜像，是小说语言变革过程中奏鸣的三部曲。改革开放以来，小说创作一直没有停息过自己语言的嬗变、叙事的变革、形态的构建。进入21世纪以来，它更乘上了新时代的动车，加速了小说叙事的重构与艺术的登攀，从而使这场名副其实的小说革命更加精彩。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这里大胆地将这部羞于拿出的、虽然已经思考了许久，但仍然相当粗浅的项目成果的引论，命名为“走近风生水起的汉语小说语言实验”。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它是对小说语言变革现状一种准确的、科学的概括，也不是说它已经囊括了小说语言实验现实中关涉到的所有关键词语，而只是把它作为对当下汉语小说语言实验现状的表征和东鳞西爪的观照而已。当然更重要的是，是将其作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希望能够催发出我们对汉语小说语言脸谱“现在时”的一些观察思考，抑或是灵感与判断。

这场“小说语言实验”是怎样发生的？它的来龙去脉留下了怎样的轨迹？这确实需要我们摒弃浮躁的心态，选取一些典型的样本，拼接一些语言的碎片，进行抽样分析和文本细读，静下心来作一番梳理。

当下，在语言学研究领域，曾经被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的潜科学——应用语言学正在异军突起，其发展态势如日中天，学术前景引人注目。毫不夸张地说，当下，应用语言学成为名副其实的显科学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个新兴学科正在崭新的历史语境下，应和着信息时代的前进节拍而日新月异、一往无前，并越来越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崭新亮

点,以及学术资源的新生增长点。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这些崭新的亮点和学术增长点,又大多聚焦在对文学语言的研究上。应该说,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它是一抹预示光明的霞光,它是一股强劲吹拂的信风,它不能不让我们为语言学研究出现的新路向而高兴、并陷入深沉的学理思索之中。甚至可以说,它不能不让每个业内人士为语言学的中兴或是研究方式的转型而兴奋不已。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本来就血肉相连、密不可分。没有文学提供的研究对象就没有语言学研究,就没有语言学的创新和发展,这似乎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然而,长期以来,它却被人们所忽略,以致一度使语言学研究陷入了悖论的怪圈,走进了难以挣脱的象牙之塔,让语言学研究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此,独具只眼的语言学者早就看到了这个症结,都力图从这个切入点“登陆”,冲出语言学研究的“围城”,实施语言学研究的胜利大突围。这种现象,从20世纪末开始就已经初露端倪。当是时,在新时期文学万木争荣、姹紫嫣红,文学语言变革标新立异、耀人眼目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敢吃螃蟹的勇者,他们高度关注小说语言的嬗变,使语言学研究向文学迅速靠拢,促成了二者联姻的“青春蜜月”。到了21世纪之初,一些弄潮儿更是大显身手,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迅速聚焦于小说话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方兴未艾,甚而形成了热潮。在此基础上,一些长期进行语言学研究的资深学者,开始注意组织跨学科的文学语言“联合作战兵团”,激扬文字,挥斥方遒,游走于两个学科的边缘领域,向语言学的学术纵深挺进、冲击,开拓了语言学研究的新局面,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文学创作的欣欣向荣,特别是小说创作的繁荣,使之成为小说等体裁发展的强大助力。

如今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对它的意义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远比当年的懵懂要清晰得多。历史证明,这是一场学术研究和创作实验的双赢活动,它的发轫和归宿都表现了合则两利的诱人愿景。当然,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它不只是语言学界自身酝酿的创造和蜕变,也是文学创作的迅猛发展向语言学理论提出的使命和挑战。是文学的客观发展,逼使其不能不“仓促上阵”,对此作出敏锐的反应和科学判定,进而交出自

己应该完成的答卷。因此，毫无疑问地说，这些科研的初步成果，是语言文学二者合力的成功。虽然，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还仅仅是开始，但是，其学理探索的开先河价值不可小觑，其创新的力度、深度令人欢欣。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审视，姑且不论它所取得的喜人成果有多少，姑且不说它填补的学术空白有多大，单就其在语言文学研究紧密结合的形式上，即成功搭建了新的研究平台评断，就弥足珍贵了。因为，它使得一度被视为学院式研究的语言学跨进了一片五彩缤纷的处女地，使得一度被视为畏途受到冷落的语言学研究增添了无限的活力。在这片茫茫的处女地上，语言学开始了新的长征，在这块十分活跃的文学实验场上，语言学有了用武之地。“创业艰难百战多”，开创一个新的学术领地实属不易。这里既有曲折蜿蜒的探索足迹，也有迷失误区的踟蹰彷徨；既有原始拓荒的胜利辉光，也有抚膺坐长叹的深深遗憾。不过，现在看来，这都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学理震荡，都是具有广阔前途的学术探索。有学者断言，正是这种学科研究的联合，将引领着语言学科彻底告别经院式研究的老模式，在辽阔的学术地平线上，矗立起语言学研究辉煌壮丽的殿堂。

也许，以上的描述有些过于乐观，然而，我们认定，这个成功的学术存在，已经或还将要产生更多的连锁反应，其对语言学研究学科版图的改写，对旧有语言学研究格局的冲击，还将联翩出现。相信，所有这些不争的事实和即将实现的图景，都会继续得到语言学界、文学界乃至新闻学界的欢迎。

当然，这只是语言学学术研究、学科建构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只不过是科学探险的小试身手，距离兴旺繁荣的学术高地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抑或是说，在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完善上，还有很多盲区需要探索，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还有许多前沿需要占领。创作在前，研究在后，一般来说，相对于瞬息万变的文学语言应用和艺术创新，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将总是力难从心，甚至是慢半拍。有时，岂止是慢半拍，甚至会落后一个时区！这并不奇怪。就当下来看，不要说对那些光怪陆离的网络小说语言，就是对那些传统的纸质文学语言，应用语言学也是缺少适时的考察、灵敏的反应。至于对文学创作语言宏观走势的观照，特别是小说语言流变嬗递的研究，其成果更是难尽如人意。然而，这一方面

问题，恰恰是文学创作最迫切需要得到回答的，也是语言学界应该立即予以解决的。现实状态告诉我们，学科建设是多么需要一些适时的追踪研究和无缝对接啊！

无疑，挑战也是机遇，解决这个问题，或许正是语言学研究真正实现学科转型，彻底摆脱“空对空”那种尴尬局面的最好契机呢！

当前，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科学发展的征途上，在“二为”方针的指引下，经过广大作家和写作爱好者的共同努力，我国内地的文学创作形势一片大好。其具体表现是，文学创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蓬勃发展，各种艺术形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绚烂多姿。就是说，形势总体上是好的，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丽日晴空的天际，还有阴云游荡；汹涌澎湃的江流，还有泡沫泥沙。缺失和遗憾历历在目，我们决不应该忽视。质言之，由于欧风美雨的弥漫，新兴媒体的冲击，不和谐因素的影响，文学创作还潜藏着不可忽略的隐忧。毫不夸张地说，这种隐忧不仅仅表现在思想指向、精神站位等方面，也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语言的创造和运用方面。比如，面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语言在文坛上的纵横驰骋，面对匮乏语言素养的部分新生代（或者说是80后、90后）少年作家对汉语言文学传统的亵渎和颠覆，面对商业话语对文学语言的渗透和影响，面对网络语言的无情侵犯和攻略，汉语言文学的写作不是出现了许多令国人担忧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吗！显然，解决这些问题正是应用语言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它进行科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是它作为应用科学研究的当然指向。因此，诠释这些新的问题，破译这些新的难点，应用语言学不但不能缺席和失语，而且更应该迎难而上，勇往直前。如前所述，我们对此不能犹疑不前、一筹莫展，不该只是埋怨这种严峻的现实是在向应用语言研究的挑战，而该看到，这是给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大显身手的平台。因此，面对文学语言的迅猛发展和急剧嬗变，学术界对语言学研究工作者寄予的希望还是那样炽烈，那就是，应用语言学的研究不能“王顾左右而言他”，而必须站在学术的前沿或高端，研究文学语言出现的新现象，回答文学语言提出来的新问题，以完成应用语言研究所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一句话，拓宽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解决文学语言运用的崭新课题，为文学创作提供一些新的经

验和参照，为 21 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作出应用语言学应有的贡献！这是历史的召唤，舍应用语言学其谁也！

正是基于这种汉语小说演进嬗替的语言变异和严峻现实，凭借对主客体的实际和学术园地的观察，凭借对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的一些比较深入的思考，凭借对一些重要的问题作了某些学术的梳理和筛选，在许多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们才最终确定了当下汉语小说写作语言实验研究的论题。“众里寻他千百度”，不为别的，我们当然为的是“蓦然回首”，科学的答案，正“在灯火阑珊处”！

在我们预设的这个论题内，我们圈定了我们的研究内容和探索的粗浅标的。

首先，在课题研究的时间上，我们将研究的范围大体局囿在 20 世纪的后半叶到时下，也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21 世纪初。从当代文学史的分期上看，这段时间是大家认同的新时期、后新时期以及新世纪之初的三个文学单元，从历史的分期来看，无疑都归属于世纪之交。当然，在具体的总结归纳之中，为了论析的深度和论题的深入，为了说清学理的渊源，我们有时也必然要突破这个不严格的时限，特别是在叙述那些非常有影响有代表性有特点的作家作品时。因为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够梳理好问题的来龙去脉，就不能阐释清某个文学现象的独特之处。比如对王蒙、王朔、汪曾祺、贾平凹、莫言等作家，他们的小说话语发展时间漫长，语言嬗变剧烈，文脉落差极大，经历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不可或分的创作历程。显然，他们完整的创作历程不能够割裂，只能整合；不能特写，只能全景，以避免一叶障目、挂一漏万。总之，我们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在历史和当下的分析上，我们着重于当下的态势，在当下和历史的问题开掘上，我们回避历史的渊源和走向，即历史和当下并重，当下与历史相连。

其次，在课题研究的内容上，我们将深入文学语言的场域，把侧重点放在对文本语言的剖析上，放在对普遍语言现象的总结上。这之中，以下两个方面将成为我们重要的学术切入点。一是宏观研究和整体的观照。就是说，要对当下小说语言态势作出一个全面的评价。这里，主要是通过世纪之交这一阶段小说语言的文本阅读和个案检视，对小说发展的总体形势进行比较客观和全面的评估、论断。当然，这也是为我们

这部不成熟的小说语言研究专著谱写的主旋律和凝定的总基调，抑或是说，是推出这部专著的总论点。这里，当然要肯定当下小说的形态嬗变和话语发展，肯定它对汉语文学写作所进行的大胆革新，它所呈现的历史进步。我们将要以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文本为例证，分析其小说创作语言运用上的成功，研究他们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运用方面所取得的创新和发展、成绩和贡献。不过，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揭示当下小说语言形态嬗变和话语发展过程中，有意无意走入的误区和迷途。我们将努力摒弃学术成见和思维定式，破除对权威的传统迷信和幼稚的“追星心理”，大胆地以某些风格流派的小说为研究对象，针对某些值得重视的悬疑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全面的考察，指出为汉语文学语言的纯洁和提升，必须摆脱的倾向和走出的泥淖。二是对当下小说语言实验出现的几种倾向的个案研究。比如小说语言的经典化、西方化、陌生化、世俗化、粗鄙化、童稚化、原生化、诗歌化、散文化、曲艺化等现象，有的将会成为论析的重点。为了厘清问题的实质，我们必然要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甚至是超文本的分析，以对我们的总体观点提供令人信服的、有支撑力量的论据。

再次，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语言学观念作为指导，采取多学科的交叉和现代化的研究方法，逼近当下小说语言发展的真谛，抵达学术研究的前沿。具体说来，就是运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个案研究和整体分析相结合、文本细读和调查研究相结合、汉语风范和西语风格相对比等方法，通过案例、引证、推理、演绎等多种必要的科研分析方式，描述当下小说语言运演的现实，透视小说语言出现的新倾向，以能够对其作出比较科学的认知。

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是一个极有用场大有前途的新兴子学科。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甚至是对其寄予学术厚望，不仅是因为它是语言学科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更重要的是它将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甚至是对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站位，都会产生深远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评估，我们就不会只是将对当代小说语言实验的观察，作为一种普通的语言学研究的命题了。

其实，它是语言学对文学的历史承诺。它是文学对语言学的殷切

呼唤。

小说艺术的流变就像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流，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无始无终。它告诉我们，小说语言的实验和变革，势在必行。

小说语言实验就是一场“革命”，它同样是一条波飞浪卷的河流，伴随着人们的艺术创造，无始无终，奔向那遥远的令人期待的远方……

远方，是那样的诱人，驱动人们去不断探索和构建。

诱人的远方，激励着研究在场者矢志不渝、勇往直前！

第一章 契机：小说语言实验的历史语境

研读五彩缤纷的汉语小说文本，赏析新意迭出的当代小说语言，观照光怪陆离的语义偏离，我们常常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来判定当下汉语小说语言实验的宏观态势？抑或是说，我们如何看待中国小说在告别了文言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语言现象？的确，我们这里绝对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庄重严肃的问题，即当下小说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走向。而要厘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小说语言流变的历史时代环境有个明确的了解。我们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些年来小说攀登艺术巅峰的实验探索的意义予以恰当的梳理和定位，才能走进当代小说语言重构所营造的多元艺术氛围，也才能顺利地迈进我们的研究课题。

无疑，汉语小说语言实验亦即小说叙事的解构重构和语言的递嬗攀升，来自时代历史的赐予，来自它邂逅的千载难逢的最佳时机。

那么，就让我们循着历史和时代留下的路标，慢慢走进世纪之交的汉语小说语言实验的视界中来吧。

一 拥抱时代赐予的转型机遇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小说是生活的写真，作为文学载体的小说语言，当然也是时代的产儿。没有伟大的变革时代，没有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就没有当代小说的繁荣，就没有汉语小说语言实验探索即它的嬗变改革的顺利进行。

下面，我们将以一定的篇幅，力图对世纪之交汉语小说语言实验面临的宏观语境，对它曾经身处过的时代氛围，作一准确的、又不失实事求是的回顾和瞻望。

当代汉语小说语言的流变，是从新时期文学大幕拉开之日才开始的，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启程的。作为文学载体的语言的变革，促成了小说体式的巨变，开出了新时期小说语言的灿烂花朵，结出了当代小说光彩照人的累累硕果。而没有新时期小说的艺术转型和那种

天翻地覆的文本革命，也就没有我们今天小说语言的异彩纷呈。那么，新时期的小说语言形态，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语境下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革呢？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契机中脱颖而出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时代峰巅上，先对其作一历史的总结和梳理，然后才能对其进行学理的追溯。在这种历史的鸟瞰与回望中，透析这条铺满鲜花和荆棘的路径，描绘出当代小说语言的宏观语境和流变走向，虽然可能还是异常烦琐的工作，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当代小说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才能够寻觅到当下足资借鉴的经验，才能绕过文学创作和语言研究的坎坷泥淖，进而到达学术界期盼的探索目标。

如前所述，在我们看来，今天的汉语小说语言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引人注目的巨变，之所以会取得这样喜人的成就，之所以会给我们的语言研究提出这么多的新课题，是因为它热情地拥抱了时代历史，紧紧地抓住了历史赋予它的变革契机，在时代历史的导演下演绎了生动的活剧。抑或是说，是因为这种流变被置放在一个宏阔的时代历史背景之下，才让它有了令人欢迎的作为。具体说来，是这样几个被历史永远铭记的时代元素，促成了小说语言叙事的激烈变革和飞速提升。

一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为汉语小说语言的实验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使小说语言的实验探索具备了极其优越的生态环境。

今天，可能没有任何人怀疑，是时代变革的崭新语境，加速了小说语言的艺术流变，将小说语言的实验探索和激烈变革推上了引人注目的实验平台。

长期以来，甚至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耳熟能详、众所周知的名言，一直都被误读，被曲解。在有些文学理论经典那里，语言甚至被皮相地诠释为只是呈现文学艺术符号的一种原始的、简单的工具，其作用不过是摹写、复制、外化作家的形象思维而已。因此，在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凭着这样的肤浅认识和简单理解，众多作家的小说语言缺乏语言本质应该具有的无限活力、应该生发的多元创造力，在多姿多彩的生活面前，有时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在当时面世的绝大多数小说中，甚至是走红的红色经典里，作家们只是利用语言这个工具，机械地制造着一些程式化的文学场景，读者们也只能透过这些语言的表象，模式化地理解、感悟、联想语言背后潜隐的生活

真谛。显然,在这种褊狭的、肤浅的认识指导之下,不但作家的语言创造力大为削弱,就连读者的认识和接受,也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和约束。不啻如此,更主要的是,由于受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和一元化文学模式的制约,所有面世的作品中的小说语言,都不能不皈依所谓的宏大叙事,不得不违心地矫揉造作,书写几乎全是豪言壮语般的语言。可见,小说语言应该承担的创新使命,在那时是完全被抛弃了、被消解了。毫不夸张地说,某些作家的小说语言运用就像戴着镣铐跳舞,刻板一致,失去了自由和舒放;就像在山间的羊肠小路上蹒跚一样,战战兢兢,唯恐跌进万丈深渊。试想,在这种环境中,还会有什么鲜活生动的语言能够出现呢?于是,小说文本千部一腔,人物形象千人一面,语言风格千文一调,成为当时的主旋。更让人忧心的是,创造思维定式也大大地规约了接受审美定式,在长期形成的接受过程中,久而久之,广大读者也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艺术审美的误区,也逐渐习惯于那种枯燥的、单一的小说流行话语了。这种现象,甚至导致了不少这样的闹剧发生:许多“路线觉悟”高的读者,由于对稍微出格的、越轨的小说语言感到反感,竟然自发地、主动地投书报刊,粗暴批判那些敢于创新的小说语言,和“左”的评论家一起,参与对小说语言创新的无情围剿。如今,当我们翻检当年批判资料的时候,似乎还听到了那无知无畏的呐喊,闻到了那浓烈呛人的硝烟,抚今追昔,不能不为这种怪异的现象而心痛不止。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此非虚言也。所以,强烈的对比反差,使我们无比感谢那个伟大的时代变动,感谢改革开放吹来的文坛春风。是改革开放的伟大举措,砸烂了我们思想上的枷锁,粉碎了我们身上的锁链,让文学创作真正获得了自由和解放。“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1979年全民族的思想解放大潮与80年代之初的文化热,使当代中国文学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翟红,2008)从此,在“双百”、“二为”的指引下,遵循文学创作语言运用的艺术规律,作家们可以任意宣泄自己的感情,任意进行自己的语言创造了。遥想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当《班主任》以深沉的思考,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振聋发聩的语言时,当《伤痕》以如泣如诉的话语,倾诉了对“四人帮”的无比愤恨时,当《啊》一声惊叹,对历史进行了无情的审判时,当《春之声》以欢快的旋律,鸣奏起改革的乐曲时,同过往时段

的小说语言相比，当代小说的语言发生了何等令人瞠目结舌的嬗变啊！

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联翩而来，意识流小说，先锋小说，后现代小说等紧紧跟随，小说艺术的巨变带动了小说语言的流变、探索和艺术重构。中国的当代小说真正走到了百花齐放的自由天地，中国的小说语言真正迎来了绚丽多彩的春天。正如雷达先生所指出的：此时的小小说语言做到了“对时代生活，人民疾苦和普通人命运的密切关注，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密切关注，对民族命运的密切关注，为此它勇敢地面对，真实大胆地抒写，以至发出了怀疑和批判的声音”^①。对于这些，我们不在这里饶舌赘述，因为，这是大家如数家珍的历史事实，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沧桑巨变。

二是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和渗透交融，以及与世界文学接轨、走向全球的强烈动因，为汉语小说语言的实验开拓了广大的天地，使小说语言品位的提升得以迅速实现。

20 世纪 80 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国门大开，古老的中国敞开了广阔博大的胸怀，接纳和包容曾经隔绝的外部陌生世界，以世人钦敬的宏伟气魄，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建设。一时间，欧风美雨弥漫辽阔的神州古国，各种思潮在华夏大地上汹涌奔流。在这种时代的氛围中，中国作家开始主动接受西方文学思潮、流派的影响，新时期小说语言的变革也就从这个时期开始了漫漫的征程。以王蒙、宗璞等为代表的一部分作家率先垂范，借鉴西方现代派作家的语言外壳和写作技艺，创作出叫文坛刮目相看，让读者耳目一新的作品。这其中，尤其是以那种被命名为“意识流”小说的语言和技法为大众所惊讶，为读者所欢迎。包括评论家和广大受众，都对这种中西结合的小说语言由陌生到熟悉，由隔阂到喜欢，最后，甚至都对这种小说语言的创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小说文本的语言变了，变得那么迅捷，那么剧烈，那么令人振奋。岂止是小说，在诗歌创作上，舒婷、北岛、顾城、江河等年轻诗人，在那难忘的七八十年代，也几乎是同步推出了震惊文坛的“朦胧诗”，也在文学语言的创新方面给我们带来新的思维，给小说树立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显然，“意识流小说”和“朦胧诗”作为新时期文

^① 雷达：《对现实主义生命力的几点思考》，中国作家网 2009 年 10 月 29 日。

学发轫时具有轰动效应的文学坐标,既对此后文学创作的繁荣影响极大,也对小说语言的创新刺激颇多。“可以说,它们是在文坛上爆炸了的两颗高当量的原子弹。而它们最深刻的影响,最主要的功绩,则是在文学创作中掀起了一场文学语言的革命”。(吴开晋,2000)实事求是地说,这才是王蒙所说的、能够引起“轰动效应”的真正“震源”。应该承认,正是这种轰动效应改变了人们的文学期待视野,正是这种语言变革引发了文学界内外对文学语言本质的进一步思考。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之后,西方现代文学流派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入。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存在主义、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新时期文学的创作方法或叙述方式产生了影响,其中对小说语言的影响更是引人注目。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市井小说、乡土小说、现代派小说以及此后的职场小说、反腐小说、校园小说等轮番表演,“新生代”、“晚生代”作家竞相涌现,“新闻小说”、“新状态小说”、“新历史小说”等旗号不断翻新,使小说园地万紫千红。这样,与文学潮流的迅速更替同步运行、与时俱进,小说语言也必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多维发展,多元并进,多样呈现。

检视当代小说的发展轨迹,我们就能够发现,当年的新时期小说语言与20世纪前半叶的小说语言相比,表现出许多“前无古人”的特点,显示出许多现代化的观念。这种超越前人的跨越实属来之不易。只要我们稍稍联系一下围绕意识流小说的“看不懂”而引发的困惑和轩然大波,就会感到读者在遵守既定语言规范上的要求是何等苛刻,阅读的审美定式是多么难以改变。新中国成立以后小说语言一度出现过的贫乏和荒凉,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可以检讨,但是长期的闭关锁国,拒绝和外域文学语言的交流,无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现在好了,这一页翻过去了,作家常接四海文友,文坛笑迎五洲来风,一个个小说创新的“群英会”,文学交流的“广交会”,带给我们无数崭新的信息和良好的参照。面对这些,小说语言焉能不变?读者的接受审美焉能不变?这种巨变和成功,当然要归功于时代历史,归功于人们观念的更新与提升。没有这些,旧的模式就不能彻底消弭,历史的恶作剧就不能落幕,新的话语关系当然也就不能建立,因此,不必担心我们自我话

语的失去。铁凝说得对：“通过与世界的对话和交流，中国作家们对我们的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有了更深刻的体认。我们与他人对话、交流，在对话交流中，我们一方面理解了他人，另一方面，我们也更为珍视我们的特性。全球化趋势没有、也不可能泯灭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差异，相反地，它只会进一步加强民族文化的自觉。”^①

三是中国社会的迅速转型，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不同文化需求，催促小说语言必须紧跟广大受众审美的步伐，使小说语言不能不发生迅速的衍变。

原生态的歌手们常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这话放在小说美学的审美探求上，也不无道理。就是说，小说语言的嬗变改革，和中国社会文化的迅速转型，和社会各个层面的文学需求，是密切相关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文学新时期的序幕，随着思想的解放和文艺思想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各种文学经典被重新解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也不断被学界重新阐释。从现代语言学的观点看来，这句名言早就该被重新解读和诠释，早就不该被看作金科玉律了。这种重读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因此，其内涵和外延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多元，确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我们看来，它意味着，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既是通过语言形态来呈现的，又是通过语言方式来实现的。语言不应该被视作游离于文本之外的工具，而应该是消融于文本之内的物质材料。抑或是说，语言不再受制于如何传达内容的固定指代关系，语言将以语言自身具有的无限张力即生动的创造力，努力自由地表现文本所要表现的内容。事实上，新时期文学的真正“复苏”，正是由于文学语言的首先改革创新带来的。因为，小说艺术模式的更新，是以语言的变化而最终获取和表征的。改革了的小说语言所承载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更新了的小说艺术模式。作为观念形态的具象物，小说必然要借语言而存在，必然要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小说语言艺术的重构，其语言秩序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新的有序的建构，和小说语言符号系统的动态平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小说语言改革的轨迹，和小说存在方式的变化，应该是重合的、关

^① 铁凝：《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作家通讯》2008年第6期，第1页。